

法治头条·法治实践新探索②

浙江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推进“诉源治理”，最大限度在诉讼程序前防范化解矛盾纠纷

不用打官司也能解纠纷

本报记者 倪 弋

今年69岁的宣永富，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村民。前不久，邻居盖围墙占了他家的宅基地，气得他举起榔头准备砸掉围墙。村干部上前拦住了他，把他和邻居请到了村调解中心。“干部帮我们调解矛盾，摆事实、讲道理，我们心服口服。”宣永富由衷地说。最终双方握手言和。

近年来，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提升，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步入司法诉讼渠道解决，导致诉讼案件量不断攀升。浙江省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。

半个多世纪前，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“发动和依靠群众，坚持矛盾不上交”的“枫桥经验”。2019年以来，浙江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大力推进“诉源治理”，最大限度在诉讼程序前防范化解矛盾纠纷。2019年，浙江全省法院新收各类案件168.6万件，同比下降4.6%；2020年，全省收案数同比下降7.2%。

源头“治未病” 从“事后解”到“事前防”转变

“诉源治理就是对诉讼的源头治理，即通过多种治理手段，预防潜在纠纷、化解已有矛盾、减少进入诉讼环节案件数量或有效分流诉讼中的案件。”浙江省政法委相关负责同志说，诉源治理的关键在于源头“治未病”，将治理环节向前端延伸，把预防矛盾纠纷体现在社会治理、重大决策、预警预测等各个方面，从根源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。

存在“民转刑”风险隐患的纠纷类警情，在接处警完成后如何进一步跟进化解，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公安机关的难题。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，很可能滋生更大的风险隐患。

前不久，浙江金华市婺城区罗店派出所接到报警称：村民胡某建房施工，将其房子墙角正对同村村民陈某家大门，陈某不满，怒将施工的铲车和挖车玻璃砸碎，阻挠胡某继续施工，因此产生矛盾纠纷，现场陈某、胡某和两名施工人员在争吵不断。

由于涉事人员较多，经现场调解成效并不明显，如果简单了事，存在“民转刑”的风险，民警王献堂决定将四人带回派出所，做进一步调解工作。同时，罗店派出所指挥室迅速整理该起纠纷情况，通过“一警情三推送”平台推送至罗店镇综治平台、行政执法部门和鹿田村村级组织。在派出所调解室，民警从农村建房实际出发，结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，耐心劝导开解。罗店镇行政执法部门共同参与此次矛盾纠纷化解工作。经过2个小时的调解，涉事四人初步达成和解协议。

金华“一警情三推送”平台，正是浙江省通



③

过“诉源治理”实现从“事后解”到“事前防”转变的一个缩影。

浙江各级法院构建“调解优先、诉讼断后”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，将诉讼服务融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之中，把“诉讼治理”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，强化诉讼前端、中端和末端等环节的治理，形成“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”系统完整的工作闭环。

2019年，浙江省修订完善《浙江省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》，推动重大公共政策、重大管理措施、重大改革举措、重大工程项目、重大群体性活动等重大事项应评尽评，确保各地党委政府在想问题、做决策、办事情时都认真研究分析可能引发的矛盾和问题，把问题和应对措施想在前面，确保矛盾纠纷防范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、同步实施。

一站式化解 从“多头跑”到“最多跑一地”

走进金华市兰溪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，宽敞明亮的大厅里，迎面就是综合服务受理窗口。就像医院的前台问诊分诊一样，来这里办事的群众提出诉求，窗口工作人员根据协同系统将其引导至相应窗口，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纠纷调解等多种服务。

“你们对调解结论认同吗？”调解员黄小平的声音回荡在调解室里。“认同。”回答的声音来自黄小平对面的一个大屏幕，从屏幕下方的两个小窗口可以看出，远在上海的原告和本地的被告都在自己的车里，通过手机平台就完成了调解。

调解成功后，对面办公室的法官随即对该案进行了司法确认，一起异地债权债务纠纷圆满解决。发生在兰溪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一幕，早已成为浙江全省99个县(市、区)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日常。

浙江省通过将县级人民来访接待中心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、诉讼服务中心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，建成制入驻99个县级(含开发区)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，吸收法律咨询、心理服务、行业专业性调委会、公共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(组织)力量进驻，推动“多中心”集成为“一中心”。在中心就可“一站式”受理群众矛盾纠纷，通过“闭环式”流程处置，让群众解决烦心事从“多头跑”到“最多跑一地”。

前不久，杭州一家鞋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停产，无力支付77名职工40余万元工资，职工多次到镇政府上访。余杭法院“微法庭”工作办公室接到镇政府提出的化解矛盾纠纷请求后，依托“移动微法院”、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开展群体性纠纷就地化解，引导特邀调解员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，指导职工在线申请司法确



图①：在浙江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，农民工正在领取被拖欠的工资。

夏鹏飞摄

图②：浙江长兴县市民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工作人员指导下扫描“长兴解纷码”。

许斌华摄

图③：工作人员(右一)在浙江杭州临安区龙山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解村民纠纷。

新华社发

认，成功把纠纷化解在源头。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目前有在线咨询、在线评估、在线仲裁、在线调解、在线诉讼等五大功能。依托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，当事人不仅能选自己信得过的调解员，不用跑法院，在线视频就能接受调解，实现纠纷调解便捷、高效、低成本……通过创新推进“互联网+”调解，浙江大力推行“线上调”“掌上办”，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远程调解服务。截至目前，浙江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共进驻调解员4.17万名，调解机构5320个，在线成功调解91.17万余件。

非诉也解纷 从单一手段向社会化、专业化调解转变

“知识产权类纠纷十分专业，调解是不是不太可行？是不是必须通过诉讼才能解决？”一起知识产权纠纷，一度让杭州市民周先生十分困扰。

原来，周先生曾获得两个外观设计专利。其后，周先生发现义乌某公司擅自批发销售涉案侵权产品，便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10万元。鉴于周先生和义乌某公司身处两地，法院建议双方通过杭州知识产权·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进行调解解决。调解员通过平台的各项在线服务功能，充分进行类案比较阐释，沟通双方意见。经过线上调解，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——公司停止侵权，向周某赔偿专利费6万元。调解协议签订后，公司在调解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履行了协议。

2020年6月，杭州知识产权·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上线，该平台聚合了中国贸促会/中国国际商会杭州调解中心、浙江(杭州)知

识产调中心等9家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调解机构，近60家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入驻，来自高校、研究机构等机构的1600余位调解员在平台上向公众提供专业服务。依托平台的统一管理、统一分配、统一指导，群众和企业可以获得“一站式”网上调解服务，当事人、代理人、调解员一次不用跑，即可省时、高效地实现异地、异国在线调解，个案调解短则用时1天。

“即便是像知识产权这样极具专业性的案件，诉讼也并不一定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渠道。”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朗长华说，通过更广泛地吸纳多元化、专业性的社会力量参与，实现了化解矛盾纠纷从“单一化”诉讼向“社会化”“专业化”调解的转变。

杭州知识产权·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是浙江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，多元参与诉源治理的生动写照。

在推动诉源治理的过程中，浙江不断织密调解网络、加强队伍建设、完善调解机制，将更多社会组织和人员吸纳进来，让人民调解这一“东方之花”开遍浙江大地；宁波市积极选聘一批退休政法干警担任调解员；湖州市坚持全民参与，已有93个特色品牌调解工作室入驻中心；绍兴市越城区调配102名律师轮驻中心，推动优质律师资源参与调解……

“在判决和调解之余，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案件最后的履行，这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”镇海法院院长张军斌介绍，镇海法院建立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，对自动履行法院裁判的当事人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，对同时在诚信法院都没有被执行案件的当事人，纳入诚信履行名单，并推送至一些信用平台及各商业银行，“案件调解后，法官应当当起‘验收员’验收履行成果，确保当事人权益及时实现，这也是诉源治理的应有之义”。

解综合服务平台，支持各类非诉解纷主体进驻，发挥多元解纷平台的指挥分流作用，鼓励和引导当事人合理选择纠纷解决方式，努力形成“非诉机制提前、司法诉讼断后”的解纷流程。

此外，应建好信息网络平台，把各职能部门、各调解组织、各社会团体化解矛盾纠纷的数据贯通起来，实现信息互通、数据共享、成果共用，推动矛盾纠纷在网上解决，构建“资源共享、分层递进、智能解纷”的在线纠纷解决模式。

从根源上化解矛盾纠纷，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。其中，完善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的工作机制是根本保障，促进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是重要举措。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协调各方力量，在法治轨道上整合各种资源，才能真正形成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。

“上午6点半，手机上显示长沙的早晨气温是25摄氏度。但是在青海天峻县，气温只有1摄氏度。我们将跨越300公里无人区，抵达瓦乎寺矿山。”这是去年7月4日，湖南长沙县法院院长黄彪写下的工作记录。

湖南的法官，为何跑到了青海？

去年上半年，湖南某公司两次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，请求查封、扣押被申请人所购买的7台挖掘机、2台钻车共9台设备，涉案价值较大。而企业后台数据显

示，这些设备都远在青海省天峻县瓦乎寺矿山。

“过去，出现过很多诉讼过程中财产被恶意转移的情况，导致后续执行难。”黄彪说，为避免这样的情况，法院决定进行一次跨省保全工作。

法院执行法官和干警承受着严重的高原反应，来到海拔4200米的矿山。他们的突然赶到，让被申请人有些吃惊。被申请人让工人将挖掘机堵在路中间，准备对抗执法。

这样的场面，法官王维并不感到意外：“法和理都在我们这一边，有当地法院干警的支援，我们执法很有底气。”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普法、沟通，矿山工人终于移走了机器，打通了道路，9台设备在天峻县法院警车的护送下，抵达县城。这次异地跨省保全，宣告完成。

闻无人区，进矿山，奔袭数千里，甚至直面被执行人的暴力抗法……这样的异地执行行动，对于湖南省各级法院的法官、干警们来说，已经并不新鲜。

湖南是全国工程机械产业集聚区。过去，涉工程机械领域的执行难案件，一度出现积压趋势。工程机械的销售，常常以融资租赁、贷款销售等方式实现。“经常是法院判了，机器和钱款却回不来，坏账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负担。”湖南某工程机械企业法务工作人员说。

“工程机械可以全国跑，主要活动的地点是偏远的矿山、工地。被执行人往往存在侥幸心理，就赌我们不会去现场。而我们过去的确也存在人力物力短缺。”湖南省高院执行局副局长王建林说。

“一个案件没执行，当事人就感受不到司法的公平正义。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执行局局长郭正怀说。

为了更好地维护法律权威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，从2019年6月开始，湖南省高院在全省部署开展涉工程机械行业执行案件专项活动。

力量不足怎么办？湖南省法院推行“一体化”执行，以“一盘棋”思路统一分流案件，各州市自主调度辖区执行力量，平衡案不均矛盾。

跨区域协调难怎么办？从2015年开始，湖南省高院倡议与各地15家法院签订了异地执行协作协助机制，如今这样的机制越走越实。

湖南省高院的数据显示，涉工程机械行业执行案件专项活动开展以来，湖南各级法院完成执行案件4000余件，为工程机械企业挽回损失近50亿元。

以案说法

网络交友须谨慎 “恋爱”可能是陷阱

本报记者 张 璁

【案情】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间，杨某瑞与他人合伙成立公司，在一些网络直播平台开设直播间，招募刘某醒、孙某林等人担任女主播，程某楠等人担任业务员。这些人之间相互配合，通过婚恋交友网站等途径结识赵某某等受害人，加为微信好友后，使用话术引诱受害人在上述网络直播平台注册成为会员，进入直播间观看女主播直播。

之后，业务员虚构女主播感情故事、个人遭遇等与受害人互动交流，博取同情信任。通过上述系列行为，女主播与受害人确立虚假恋爱关系。之后，女主播编造“完成平台业绩任务才能领取提成”“想与平台签约需要解约金”等理由，先后欺骗赵某某等4名受害人在直播平台为女主播“打赏”或者直接向主播转账，合计诈骗人民币17.2万余元。

2019年9月3日，公安机关以杨某瑞等11人涉嫌诈骗罪，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2019年12月30日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杨某瑞、刘某醒、孙某林、程某楠等11名被告人拘役四个月至有期徒刑四年不等，并处罚金。

【说法】网络直播在为用户提供更参与性和人际互动性的良好体验的同时，也容易助长违法犯罪和社会不良风气。对于广大用户而言，关键是要以健康心态参与网络直播互动，切不可抱着“猎奇”“猎艳”等不良心态，落入违法犯罪分子精心编织的“陷阱”。

司法机关对于犯罪分子虚构网络身份、冒充主播，使用话术建立虚假恋爱关系，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，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骗取财物的，依法应认定为诈骗罪。

与此同时，还应加强平台监管治理，维护直播行业良好秩序。网络平台要切实担起主体责任，加大对直播行为的常态化排查和技术管控，强化各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，对列入“黑名单”主播施以严格联动管理，彻底封住其违规复活之路，净化网络直播空间生态。

湖南法院部署执行案件专项行动

破解涉工程机械案件执行难

本报记者 孙 超